

# 從文獻到歷史的隆重登場

## 「書海驪珠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珍藏展」

孫科手迹



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校慶，也為了進一步推進香港文獻學術的研究和發展，中文大學圖書館不久前舉行了「書海驪珠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珍藏展」的開幕禮。整個展覽將持續到今年的五月。

圖書館的珍藏，作用不僅僅是展示與收藏，更重要的是，是分享。基於這樣的原則，中大圖書館將諸多珍貴展品呈現在市民面前。約一百二十件，展品年代跨度超過三千年，由商代（約公元前一千六百五十一至一千九百五十六年）至當代名家如康有為、周作人、錢穆、朱光潛、錢鍾書等的書畫、手稿及信函，將與大眾見面。

### 文明的交匯

展覽中，不少展品展現了東西文明的交匯特徵。中國雕版印刷術不單止於本土發展，亦傳播至鄰近國家，其中以日本和朝鮮最受影響。然而兩國雖受中國印刷術之影響，但在印刷風格及用紙方面，卻各具特色。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日本刻本有四百六十五種，朝鮮刻本則有十種一四二九冊。其中以朝鮮刻本之《高麗藏》最具特色。《高麗藏》刻於朝鮮高宗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（一三六六至一三九五），至今板片仍然保存。館藏《高麗藏》疑為於隆熙二年（一九〇九）據原板片重印，全藏黃色經文紙印刷，橙黃厚紙封面，紅綉包角，古雅莊嚴。

塞爾蘇斯（約5 BC-45 AD）被譽為最偉大的羅馬醫學家之一，傳世的《論醫學》（一四七八）是公認最佳醫學經典，也是最早印刷的醫學書之一。本書共有八冊，詳細闡釋醫學、外科等相關問題，自一四七八年出版後，共有超過五十種拉丁文及歐洲語文的譯本。館藏版本是刊於一四九三的「搖籃本」，泛指印於一五〇一年以前的西文書籍，保留了從手稿過渡到印刷本的特色。本書是館藏年代最早的西文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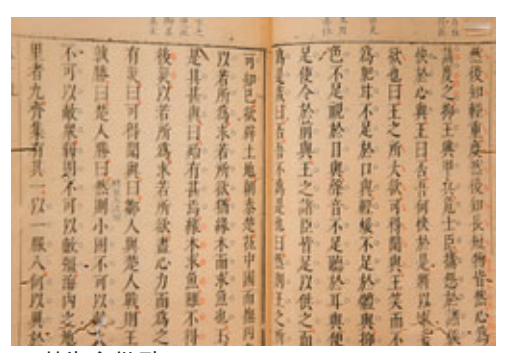
張蔭桓（一八三七至一九〇〇），字皓齋，號樵野，廣東南海人。累官至戶部左侍郎，先後兼署工、刑、兵、禮、吏部。清光緒年間出使美國、西班牙及秘魯。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，中國戰敗，獲派赴日本乞和。後因同情戊戌變法而獲罪，謫戍新疆，慘遭處決。後得平反，追復官銜。著有《三洲日記》及《張蔭桓日記》。張氏故舊，同僚於晚清所撰張氏詩詞、信札八冊，二〇〇八年歸圖書館。作者數十人，有陳蘭彬、李瀚章、杜貴墀、周恒祺、方昌翰、王光敏、李慶翱、唐啟蔭、何如璋、鮑瑞駿、薛福辰、楊宗濂等，內容多涉公務，並有詩詞贈答，為研究晚清歷史學者提供第一手資料。

### 見證革命史

孫科（一八九一至一九七三），字哲生，孫中山哲嗣，夏威夷受業，留學美國，一九一七年回國，參與護法運動，一九一九年獲派在澳門設辦事處，翌年又奉命與朱執信、古應芬在香港組織機關，支援革命工作，孫科總管財務。



王韜著作



蘇洵之批點



趙元任的樂譜

述傳記，孫科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受訪時憶述：「當時的香港政府已不過問，我們的活動也公開了。」因為香港政府的寬鬆態度，孫科籌辦的機構便能利用香港的通訊方便，聯繫世界各地，互通革命消息，籌募捐款，並借助香港的地理優勢、地方資源而自由運送糧餉、軍需物資以支援粵地民團起義，為護法運動作出貢獻。《黏存簿》收存支單據三二四份，所涉革命志士逾七十人，風起雲湧、瞬息萬變的二十年代中國政局，亦從保存下來的文獻而得見一鱗半爪。

《黏存簿》一冊，黏存支單據三二四份，其中十三份日期未詳，其餘皆立於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為孫科、古應芬、朱執信、吳鐵城等在香港活動的收支帳項，有電報費、租用船隻費、軍費、虎門艦隊伙食費、飛機隊費、衣物交通雜費、澳門辦事處伙食費及捐款等，應與孫科及其他革命志士當年為配合討伐桂系軍閥、部署陳炯明率領粵軍回粵，而在香港進行的支援行動有關。

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一九二二年刊行，其創刊詞以「負起時代責任」為題，說明出版目的，乃為當時遇到的國家問題而肩負時代責任，主辦一份屬於學生、而為海內外中國學生服務的周報。周報於二〇〇二及二〇〇八年歸圖書館。一九九七年，盧璋鑾按不同主題選輯其中文章，出版《舊路行人：中國學生周報文輯》，於《後記》介紹云：「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是一份以中學生、大專生及青少年為讀者對象的綜合報紙。創刊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到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停刊，前後刊了二十二年，屬友聯出版社出版眾多刊物之一。這份刊物，在很多香港青年知識份子心中，留下深刻印象。」

### 香港名人著

李景康（一八九〇至一九六〇），號鳳坡，書齋曰「百壺山館」。廣東南海人。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二年任香港官立漢文中文學（今名金文泰中學）校長，致力倡導中文教育。戰後主持學海書樓及碩果社，活躍粵港文壇四十年。李氏一生酷愛詩書繪事，擅寫楷書，偶作小篆，喜畫梅花、墨蝶及墨水龍，尤愛梅花。李氏一九三〇年寫《墨蝶圖》，題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句及其本人詞一闕，戰後重檢畫圖，再集孫原湘妻席佩蘭七言絕句十一首，並邀碩果社社盟題詩。碩果社一九四五年由伍憲子、黃偉伯、馮



甲骨文



朱熹文輯

## 十字路口看顧準

無論是正在着力於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香港，還是處於改革攻堅階段的內地，或許可以回看一下中國現當代著名的思想家、經濟學家顧準的學術成就、探索歷程與人格豐碑。

當中國經濟在計劃時代中艱難前行時，顧準第一個發出了走向商品、走向市場的號角。這在當時是離經叛道，但卻為後來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石。精通外語的他，翻譯了大量學術著作，也寫下了不少自己對現實家國的思考與探知。《希臘城邦制度》、《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》，都成為後來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們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工具。

民主與科學的關係，在顧準《科學與民主》一文

中有着較為詳盡的論述。關於民主，他不盲從、膜拜民主的話語和概念。他認為，民主必須建立在科學、啟蒙的基礎上，必須是一套完整和均衡的制度設計。他將制度的民主化視為政治體制生命力的延續與精髓。因而，在顧準的民主思想框架中，制度設計是以科學化的理論與思維構成的，民主的政治現實必需建立在科學的普及與了解上。這裡的「科學」，是民主化制度本身所具備的民眾素養——啟蒙。惟有啟蒙才能帶來科學化的制度設計，才能帶來包容。顧準的探索，打破了民主的崇拜，從而顛覆了一直以來將「民主救亡」視為近現代中國歷史主軸的歷史話語模式。故而，顧準的《科學與民主》，實質上是在探討啟蒙與救亡、革命與人道的關係。在顧準所處的時代中，民主與科學的位置排序裡，民主往往優先於科學。但顧準就民主與科學的關係得出自己的結論：惟有立足於科學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種可靠的民主。

顧準的思想價值，不僅僅是對自身時代的理性解構，更是超越歷史與未來的文化反思。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與認識，提出了一套面對歷史遺產，進行拆解的方法和觀念；他對意識形態與現實對應所形成的理論概念、內涵甚至價值的反省，構成了後來學界對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等名詞進行再定義、再討論的基礎。以顧準的「沒有什麼終極目的，有的只是進步」一語作為概括，便是對其思想的一種傳承與深化——與其局限在不同的理念、詞彙爭議中，不如去具體地解決實際問題，畢竟，「空談誤國，實幹興邦」。

科學不是無休止的爭論，不是唯我獨尊的理念化身，而是真誠的傾聽與對話，是對不同利益訴求群體的整合與妥協。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，民主膜拜已經成為一種時髦，回看顧準——這位被學界推崇的中國社科元老的思想先鋒，或許能夠給置身於民主聲浪中的所有人一種新穎、冷靜和全面的思考。這或許就是顧準在當下給我們的最大意義。

文：徐全